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陈漱渝 主编

ZHONGGUO DANGDAI WENHUA XIANXIANG

回应

韦君宜

HUIYING WEIJUNYI

邢小群 孙 珉 / 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回应韦君宜

邢小群 孙珉 编

陈漱渝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应韦君宜/邢小群等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3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ISBN 7-80094-128-0

I. 回…

II. 邢…

III. 韦君宜—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375 号

责任编辑:沙 漠

回应韦君宜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375 字数 368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3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094-128-0/I·61

定价:22.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联系: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 84040746



韦君宜先生



韦君宜与杨述摄于陶然亭(1975 年)



1937 年夏天在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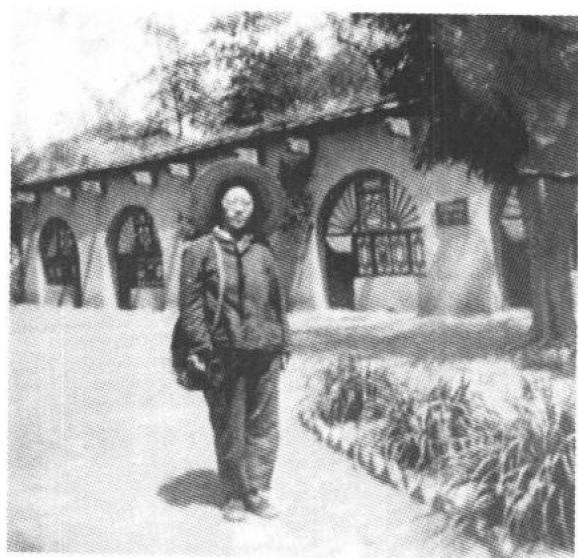


1980 年访美摄于纽约



韦君宜与女儿杨团在承德(1981 年)

1972 年韦君宜在
延安枣园留影



1973 年，韦君宜从干校回来，女儿从边疆回来，
一家自文革后重新团聚。

代 序

杨 团

1998年6月,我从美国归来。下飞机刚进家门,端端正正摆放在书桌正中的《思痛录》样书一下子跃入眼帘,心蓦地狂跳起来。啊,终于出版了!我把这本薄薄的小书宝贝似地捧在胸前,深深地呼吸着,只觉得油墨的芬芳沁入心脾,眼前又浮现出病榻上的母亲紧抿着嘴唇,悲哀地望着这个世界的面容……不觉得眼眶湿润了。妈妈,我亲爱的妈妈,您二十年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何止二十年,是整整半个多世纪,您和您那一代人 so 付出的,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啊!

初识《思痛录》

《思痛录》在成书前有一段难忘的口述史。

记得那是文革中期,1973年,我刚从云南陇川农场转到张家口聚氯乙烯厂当仪表修理工。三年零七个月,我在远离北京的大西南,和在河南的父亲、湖北的母亲、北京的弟弟天各一方。自1966年父母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家被抄,东西被砸烂了,房子没了,全家离散整整七年,到1973年才重新聚首,我怎能不格外珍惜这劫后余生的团聚。那时我常常在周六早晨上完二十四小时连班(化工反应釜需要仪表持续监测,仪表修理工每

值二十四小时班可休息一天),觉也不睡,就搭乘京沙线,来回颠簸整整十三个小时赶回到在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那两间狭小、简陋但是温暖的小屋里。

当时我真像母亲在《当代人的悲剧》中提到的,开始从自己和家庭的伤痛中走出来,弄了一脑子的问题。在外面不能问,只有回到家里问,有时想不通就和父母争辩。当时我最想不通的就是:毛主席不是一直说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那为什么还要把那么多好人都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右派搞多了还要摘帽,打了这么多走资派为什么七、八年了还是这个样子?父母告诉我:1943年在延安就有过那么一次,毛主席说特务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结果成千的忠实的共产党员都被打成特务。凡是从敌占区来又坐过敌人监狱的,无一例外都是被敌人派进来的“红旗”特务。原来那时就有“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说。我听了还是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敌人越多党就越安全吗?”

记得有一次,不知我哪一句反驳的语言惹恼了母亲,她愤愤地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团团,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有一天我要被你出卖的。”这话一下子震惊了我,迄今我还记得她当时脸上的表情,记得我那莫名的惊诧。我的妈妈呀,竟会怀疑她的女儿会出卖她!自然,后来我就努力多听、多想,插话也大多是问情况的了。我就是这样听到了所有后来被母亲写入《思痛录》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故事越讲越长,从打“AB团”,延安审干开始,讲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延安的“轻骑兵”,解放后的肃反、打老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等一系列曾经冤枉过人的运动,也包括大跃进中的荒唐和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种种。让我听了震惊甚至恐惧的还有斯大林的暴虐和苏共二十二大,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斗争,以及中苏两党在整人上的惊人

的一致和从建国前就存在着的矛盾。说老实话,我的真正的大学是在那四年(1973~1976)完成的。如果说文革头七年的遭遇和磨难是锻造我意志的铁砧,那么,后四年的家庭讨论会则是开启我心灵的钥匙。我至今怀念那四年白天盼着天黑,吃过晚饭就拉紧窗帘,关上大灯,一家人围坐在一盏台灯前,同志加亲人的热烈而又有点神秘的讨论,它真的使我受益一生。

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萌生了要写一部书的念头。她当时常常对我讲,你们太幼稚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的多灾多难,交到你们这一代手里怎么得了。而父亲对母亲说:这是我们的不对,是我们过去什么也不让他们知道。其实,父亲早在文革初期就对我讲到过延安审干运动,告诉我他曾被戴上特务帽子遭批斗的情景。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时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吴传启为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头功,在关锋等人的授意下,在学部抛出了“批判青春漫语大毒草,揪出杨述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母亲当时在河南安阳四清。5月下旬的一天,我下学回家,父亲神色严峻地说:“你怎么才回来,我等你好久了。”然后他像竹筒倒豆子,把学部当天所有的情形都对我这个当时才上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统统说了。我那时傻傻地看着他,怎么也不懂昨天还是老革命的爸爸,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但是父亲接下来的一段话却像刀刻一样此生此世铭记在我心里了。他说:“团团,现在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我以为解放了,一切都好了,你这一代再也没有苦难了。我只给你讲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不让你知道党犯过的错误,党内斗争很残酷、很坏的一面,其实我们这个党从来就不纯粹。你以为道路笔直,党是永远不会错的,跟着党走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果别人一句都批评不得,一点委屈都受不起,是我让你变得这么简单、幼稚,我怕你经

不起今后生活的打击啊。”接着，父亲讲了1943年在延安审干运动中的经历。他曾经被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一年多，其间向毛主席上书，直言：“毛主席，我不是特务，请你派人彻查。”未获结果，后来由彭真同志出面谈话才算摘帽平反。

我当时缩在宽大的藤椅上，两手抱着膝，睁大了眼睛听那可怖的一幕。我开始相信，这绝不是谎言，1943年共产党就能把才二十岁就毁家纾难，动员一家老小变卖家资、七八口人奔赴延安的爸爸被打成特务，那么今天学部的事一定是真的了。我那幼稚的心里已经模模糊糊意识到大祸临头了。当时父亲在堂屋里走着走着，忽然指着头顶上的吊灯说：“那时候有一回挨斗，我突然想一拳头把屋里那盏吊灯砸烂，可是再一想，我一定不能动手，一定要忍住，不然，我就真的疯了。我是拼命抑制自己才没有变成疯子啊。”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我就禁不住双泪长流，因为随后不久在学校斗我这个未满十七岁的“校领导的红人”，“反工作组的黑崽子”时，我也曾有过与父亲一样的念头。我虽然挺过来了，但我亲爱的妈妈，却由于年轻时有过精神创伤（她的第一个爱人，清华同学孙世实在抗战时期牺牲了），1966年8月她从河南四清前线刚返回北京就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不让回家被拉走批斗而精神失常。她患忧郁型精神分裂症整整三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认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杀……

就在那一晚，父亲告诉我，这一次运动来势凶猛，估计比延安抢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要我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的问题至少要三年才能解决。结果，连他自己也未料到，这一次的平反竟拖了整整十二年半。到他拿到平反结论时，当年那个壮健的中年人已经变成说不出几句话也走不了几步路的奄奄一息的老人了。而当时的我，突然遭遇这一切，一下子懵了，哭着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哭着哭着蜷缩在藤椅上睡着了。

现在想来,父亲之所以在那一天夜里一下子谈这么多,这么深,完全是因为他对形势的估计非常险恶。他唯恐第二天就会被关起来,从此几年不见家人面,再也来不及做任何解释。他唯恐他最宝贝最心爱的女儿会真的以为他是反革命。后来的事情证明,他什么都可以忍受,只有这一点是他最最忍受不了的。所以,当时他几乎是当做遗言在讲。到了1973年全家重新聚首时,父亲讲述这一切已经没有了文革初年那悲壮到极点的气氛,可以理性地分析和探讨了,而我的认识仍然幼稚之极。也许正是从我那些幼稚的想法中,母亲和父亲一样,痛切地感受到了对年青一代“愚民教育”的危害。为了免除子孙后代因无知、盲从,重蹈他们那一代的苦难,为了让普通老百姓了解和记住那一段痛彻心脾的历史,为了让后人在痛定思痛时,从史实中追索产生这种一整代共产党人历史悲剧的真正根源,如实记录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己人的想法在她脑海里成形了。

母亲写《思痛录》

《思痛录》大约在什么时候开始动笔的,据我回忆,是在政治空气极端恶劣的那一段,即“四人帮”粉碎之前,周总理逝世的前后。

当时母亲虽然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要领导,但是军宣队还在,她的日子并不好过。平日里工作很忙,又经常出差,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写作。偶尔写一点她也从来不收拾,草稿撒落在桌子上哪里都是,而且经常随便拾片纸就写,还特别爱用那种没有格子的最便宜的宣纸。可是,有一段我却发现她写东西有点不同往常。她写在十六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迭稿纸上,每逢吃饭,出门都把稿子放在书桌旁第二个抽屉里。有一次

出于好奇，我伸手去抓那稿子，被她一把推开，问她写什么她也不说。母亲写东西如此保密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惟一的。记不得过了多久，也记不清是她先告诉我还是被我自己翻到了，我知道了这就是那篇“抢救失足者”，后来被收入《思痛录》作为第一篇。

“四人帮”粉碎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我公开了她的秘密。她要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十八岁参加共产党，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可是，写出来却绝不可能发表。到这稿子真能发表的时候，国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她还对我说：“我活着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写完了你一定要给我好好保存，等到真能发表的时候再拿出去。”这话她千叮咛万嘱咐了好多遍，总是不相信，怕我马马虎虎，直到我赌咒发誓才作罢。我于是明白在她心目中，这稿子比她所有的作品，甚至所有的工作都更加要紧。

1986年初，已经六十八岁的母亲才离开工作岗位，开始了她的离休生活。每天忙忙碌碌的她突然一下子闲下来，她似乎有些接受不了自己退出社会主流生活的事实，整天还在盘算要到哪里出差，要做些什么事情。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4月间的一天上午，当她在作协召开的一次文学作品评论会上发言，手伸向茶杯正要举起喝口水的当口，突然茶杯哗啦一声砸在桌上，她两眼一闭，人事不省了。等我赶到协和医院，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她已经被送入病房紧急抢救，仍然未醒过来，被大夫诊断是脑溢血。她的出血部位是在左脑，CT片子上核桃大小的出血痕迹赫然可见。后来大夫告诉我，这个部位出血，况且又有这么大面积，一般情况下必死无疑，她能活下来，本身就是奇迹；而她居然恢复到能走路、说话，甚至还能写作，更是奇迹中的

奇迹。医学上无法解释，如果要解释，只能说她是作家，终日用脑，所以大脑功能被破坏后的恢复和一般人不同。

当夜我一直守在她身旁，到夜里十二点多钟，在药物的帮助下，她那顽强的生命终于苏醒过来了。她微微动了动眼皮，一定是听见了我在她耳边拼命地叫喊，努力撑开眼睛，认出了我，然后艰难地卷着舌头翕动着嘴唇。我竭力分辨那模糊的发音，她是在说：“我完了，我不行了。”我一下子哭出来：“妈妈，你总算活过来了。”

三天后，当她完全清醒了，就立即开始了那顽强到残酷程度的自我训练。每日记着数，刻板地练习抬手、抬脚、握拳。为了能再继续持笔写作，她让我买来小学生用的格子本，说“我要从一年级上起”。她僵直的手指完全握不住笔，第一天练习可谓一笔上天、一笔入地。不过练习极为见效，那四个被她在封面上填上一至四年级的练习本，是她恢复书写能力的见证。第一页上满是歪歪曲曲的笔道，以后就像一两岁小孩画画，再以后就勉强可以辨认字形，最后的几页甚至于可以看出一点昔日的笔体了。那本子上写满了唐诗宋词，而且居然一首都不重复。一个月后，她开始下地练习走路。三个月后，大夫就说可以考虑找个康复院练习功能了。我们实地去调查了一阵，最后与母亲共同商定，选择了北京郊区新开的一间民营康复院，把她搬了过去。她到这间康复院大约在8月间。入院的第一天，她就把所有的功能训练器械统统尝试了一遍，拄着拐杖在楼道内咚咚地急迫地走着，不让我扶她，那情势好像她的心跟着拐杖把步子先于自己的脚迈出去了似的。在这间康复院她一直住到冬天，直到天太冷取暖设备差不宜再住才离开。后来，她写出反映她在康复院生活的散文——《病室众生相》。当我读到这篇散文时，真的大吃了一惊，我惊异劫后余生、重病在身的母亲居然能如此迅速地恢复

了脑力,这一篇的笔力与她病前作品的差别,不很熟悉她的人几乎看不出来。

母亲的遗嘱

1986年深秋,一次,母亲从康复院回来(她在康复院时每逢假日我们都接她回家),坐在书桌旁对我讲:“我不行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完了。我要立遗嘱,你拿纸笔来给我记录。”她那时的身体状况比刚进康复院时差一些,又犯过一次病,使她几乎失去了恢复的信心。当时我知道她心里很难受,不愿这样委屈地活着,就与她乱开玩笑,怎么也不肯照她说的做。直到被她厉声呵斥才不得不拿出两片纸,一边听她讲话,一边打岔:“你就会杞人忧天,你命还长着哩。”我龙飞凤舞地把她的话记了下来,除了遵她之嘱给她念过一遍外,根本未交给她,自然更想不到要她签字。可是,人的一切有时的确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的。我怎能料到,我这玩笑似地记录下来的她的话,居然真的变成了她的遗嘱。她现在已经瘫痪到连舌头的肌肉都僵直了,再也不能言语了,耳朵全聋了,身体也完全不能动了,只靠鼻饲维持着生命,但是眼睛依然清亮。每次见她,我只能从她悲哀的眼神里感到她的大脑还活着,也许还在思想。

这两片纸被我好好地保存着,看到它,我就觉得人生无常,人事无常,不觉悲从中来。母亲的遗嘱分为“我的作品”和“我身后事”两个部分。作品又分为“我的小说集”、“散文集”、“杂论集”和“我的回忆录”。今天可以告慰母亲的是,她当年所有的愿望,如今大都在她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实现了。特别是在87年后,她不仅又写了十余万字的散文随笔,还以病残之躯,完成了“抢救失足者”的姊妹篇——十余万字的自传体小说《露沙的

路》，并先于《思痛录》于1994年出版。

关于《思痛录》，遗嘱是这样记录的：“我的回忆录只差最后两章。我本来希望无论如何把最后两章完成，现在不行了。有一章在抽屉里未发。《山西文学》和《当代》（发的）散在外面，《新文学史料》有一章即登，纪念李兴华的插在中间，按时间排序，共十四章。还有两章纪念周扬，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写不出了。在黑柜子里有两个小口袋，一个手稿，一个抄稿，最后的几章未装在口袋里。”

从母亲立遗嘱那天起，原来由她自己承担的《思痛录》以及小说集、散文集的编辑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小说集和散文集收集完作品后，很快转到了出版社编辑手里，只有《思痛录》不可能给任何人编辑。我开始一遍遍地翻原稿，找出她未发表的文章，按时间排序并与她磋商每一章的名字，以及给全书命名。关于全书，她起过几个名字，我以为《思痛录》最好，最简洁，最能引起后代人读懂全书后痛彻的共鸣。所以在1997年当林文山同志拜托我告诉重病在床的母亲出版社希望改换书名时，我当即申明她不会同意。果然，母亲不但不同意，而且还说：“内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

我当时从黑柜子的抽屉里翻出母亲说的那两个小口袋，里面放着《思痛录》中最珍贵的前八章，从“抢救失足者”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拾零”。这就是母亲从1976年就开始写起，大约在1983年基本完成的被她视为宝贝的八章。抄稿是我那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两整天未归家的疯弟弟都写的。当母亲病好了恢复工作以后，自感平生最内疚的一件事就是对不起弟弟。在遗嘱中“我身后的事”整个讲的是他。为了弟弟，母亲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迄今一想起来就令我既心酸又敬畏——我自知如果我是她，肯定做不到这些。她曾

为了给弟弟补习初中课程——因为他只上到小学五年级文革就爆发了，之后得了精神病再也上不成学了，居然有一段时期每个星期天都跑到外交部街的小图书馆和东城区图书馆翻书、借书、备课，回来再讲给弟弟听。就这样母亲居然把历史、地理、数学、语文几门初中课程都给我这个傻弟弟补完了。而这一切，还都是在她离休前那繁忙的工作期间完成的，这需要多么博大的母爱和多么顽强的毅力啊。当弟弟抄稿时，我曾问过母亲：“这些稿子不能传出去，他要说出去怎么办？”母亲沉吟了一下说：“不会，他的脑子没有好使到那个程度。”的确，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对的。

编辑《思痛录》，我尤为认真。每一篇都读，有时会讲点感想给母亲。那八章以外的各章，哪篇宜放入，哪篇不宜，也进行讨论。自我上大学后，母亲已经完全视我为朋友，除个别篇外，所有作品全向我开放，甚至在发表前专门听取我的意见。我有时戏谑地说：“我既是你的第一读者，又是你的业余编辑，你得给我发津贴呀！”《思痛录》现在出版的本子，除出版社认为非做不可的篇目删节和字句改动之外，保持了原样。

记得《思痛录》的头几章也是经过了修改的。1982年夏天我刚大学毕业，孙友余同志要我向当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同志引见一机部派出的中国第一位留学哈佛的法学硕士，由此有了我和母亲与这位唐先生的交往。母亲后来帮助他解决了被人冤屈的事。交往当中，这位唐先生曾亲口告诉母亲和我，他在美国曾遇到很多位华裔美国教授。不少人是当年清华、北大的学生。当谈到那一段历史，一位教授告诉他，他们当时在学校充其量只算二流的学生，真正一流的、在学校拔尖的全都投奔了共产党；而且当下就真的点出几个人来，说是这些人如果来美国发展，那一定会有辉煌的成就。唐先生走